

學言

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第三十九期

《學言》 目錄

齊家學：新六藝的精神開展

唐霍《論語》之道：繼承與開新

本會通告	1
許志毅：第六講：相守以信（一）	1
陳健恩：霍學《論語》十一：仁是性情，仁是動力（五）	3
黎老師說中國人的中國史—深情大願千年志 （許志毅）	4

本會通告：

今期開始，開講「黎老師說」系列，她所講的歷史、家教、唐學及文學，深入人心，直指內在靈魂深處，聽者無不動容敬服。第一部所講的，就是「黎老師說中國人的中國史」。

第六講：相守以信（一）

許志毅

上一講，我們論及禮之深意。要言之，禮，從起始而言，是人與人初步接觸之時，向對方示好的見面之禮；從其極致而言，則為人突破個體生命，進而與整體世界融合之修養工夫。這一講，我們從禮之起始而言人之進一步禮節。

見面之禮，實為人與人開始接觸之時，根於人“欲向別人示好”之念，進而產生具體之禮貌舉止。很多人會認為不同的社會或民族，因為有著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歷史背景、不同的生活方式等因素，所以便會產生不同的文化風氣而有不同的見面之禮。例如，西方人見面，會以握手之禮向對方示好；愛斯基摩人會以擦鼻子方式打招呼；印度人會以手放胸前向對方鞠躬；中國傳統禮節則以拱手鞠躬之禮以表示尊重。

若我們平面地看，則不同文化之下的見面之禮可謂五花八門，各自精彩。下面我們將從生命成長的角度論述中華文化傳統見面之禮之特殊價值與貢獻。為簡化論述，我們不妨舉西方握手之禮作一比較。當一人見友人出現，向對方伸手示意，然後對方伸出手，雙方互相握手表示友好。此過程中表達了人主動接受對方、願意與對方親近、交流、表示友好之情懷，此固然源自人本於性情而“欲向別人示好”之念而生，然而在其文化背景之下，此“欲向別人示好”之念，往往未能得以深化。

因為西方文化比較強調外向思維，故在此背景之下，禮儀被視為一種社交習慣或社會道德規範之要求，故人自身內在之“欲向別人示好”之念往往容易被忘失，心靈向外而生起“遵守社會規範”之念。若只是順著“遵守社會規範”之念，則心念便會“動而愈出”，難以回頭向心靈內部自省，進而自覺地讓性情進一步流露。本來，人於“遵守社會規範”之一念，若能反省到原來是有著“我自己的內心是想自己遵守這些規範”之意識的，那麼人就有機會深一步感受到心靈內在的要求而使性情進一步流露，可惜在以外向思維為主流的文化脈絡之下，人很難有此反省。按照我們的了解，在外向思維模式主導之下，禮便成為一種“遵守社會規範”的外在要求；如此之守禮模式，是基於他律而非自律所產生的“服從外在規範”的要求，即此而言，即非真正的道德活動，蓋道德活動，必為自律、自覺的自我要求。

至於拱手鞠躬之禮，固然當中亦含有社會道德規範之意味，亦乃根於“欲向別人示好”之念。在此禮之中，當人與人見面，本於性情而生起“欲向別人示好”之一念之後，並非馬上主動跟對方身體親近接觸，相反，而是保持一恰當距離，拱手向對方彎曲身體以示好。此處即與握手之禮大相徑庭。若從表面去評價，即會容易令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拱手鞠躬之禮，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增加，因為一般的想法是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該以“打破隔膜，互相親近”為要，故近代西方握手等身體接觸之禮，除了歷史原因之外，此等禮儀能讓人很隨和地拉近距離的作用，相信是其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順此，則不少人會認為拱手鞠躬之禮讓人與人之間產生距離、甚至成為人與人之間的束縛。此乃錯覺，純因不了解拱手鞠躬之禮背後之深意。我們要先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生起之根源。真正的隔膜，乃心靈上的隔膜，而非身體上的接觸與否；而此心靈上的隔膜，乃源於心靈之不開放、自以為是、以自己的角度去衡量世界與別人、以自己的角度去要求世界與別人等，使人處於一自我封閉之狀態。在此種狀態之下，即使身體與別人有所接觸、態度上跟別人很親近也好，內心其實還沒有真正打開，乃至沒有真正的接納別人，難以與別人產生內心的交流，此即現代交通通訊發達，大家接觸容易，卻為何人與人之間仍然容易覺得孤獨之理由。

拱手鞠躬之禮，實乃一具有修養工夫意義之禮節，可以幫助我們突破這種“自我封閉”之狀態。當中的要義如何？我們下期探討。

（下期待續）

霍學《論語》十一：仁是性情，仁是動力（五）

陳健恩

「孔子的學問一直有一個主題，就是人的成長」（頁114）

「為甚麼要把自己的生命局限在這裡」（頁114）

人生有主題，就是「吾道一以貫之」，人生之局限，就須要「反求諸己」。人生居然有主題，固然是一大發現。以「反」去局限，是另一大發現。

「一」是方向之道，「反」是踐行之道。方向，有深知，有淺知。深知，才有智慧。想深知，便要靠踐行。要以「一」作目標的行動才算是踐行，其他目標的行動，是散亂的，很難從中抽出成長的經驗，反省到生命的果實。踐行中的果實，才有深知，即知這個「一」大約說甚麼。所以，無踐行而講道，根本是淺知。自己未體會多少這個「一」，就算能讀書識字，都是盲目行。雜亂的人生經驗，是累積不了成果。淺知便淺行，淺行便淺知。所以起點絕不在淺知，必當先嘗試踐行，建立好一個思考的內容根基。這個內容，不能雜亂無章，所以不是經驗，而是踐行的體會，內容要較為純正，才能結成晶體，才能成長智慧，結不成晶體，就是混濁一團水，淺行淺知，生命是難以成長。

生命有成長，更深知，依此深知，更信此行。所以，知行合一，合非混合，而是往來循環不息。知行互動而得「一」，即得成長，這是「成長動力論」。

文章標題二之：“性情是感通的主體”

成長是方向，方向要知，才會有用。成長是過程，過程要行，才會起用。有作用，現實才真變化，自己才真變化，別人才真變化。只有一個知、一個行，都是沒有用，一定要循環互動。人為何要讀書？因為要成就這個知，以此知去帶領踐行，指導踐行，引導反省。由知及踐行帶動反省，此反省再帶動讀書，這時才知要讀甚麼書。動力，就在這裡發生了，成長便會自然。

從側面看：人有時自覺，脾氣中的我不像真正的自己，追趕名利的我迷失真正的自己，嬉戲人生的我未真正了解過自己。找不到，以為找到，未曾找到。究竟都在找甚麼呢？

所找的，就是覺不覺人有一個真正的自己？

說自己有靈魂，有靈性，有甚麼能力作用，都是思想作用，不是從覺而來。

脾氣，心理愛惡，性格表達，生理溫飽，都可從覺而來，但我們不認為這些能足夠完全代表我自己。究竟人可否從覺之中，肯定到真正自己的存在？

這個肯定很重要，因為人只依覺才真信無疑。人真信有一個真正的自己，才有真正的勇氣，真正的自信。人生，才可以真正開始。（下期再續）

黎老師說中國人的中國史—深情大願千年志

許志毅

上過黎老師課的人都知道，她重視歷史，並且有著很深的中國史學素養。她生命中常常煥發著一種濃厚的歷史文化感情與精神。她在〈書和我〉一文（該文書於黎老師讀大學的年代）之中提到，面對中國近代史，“我的心隱隱作痛”、“同胞用血把它（指中國近代史）編纂成史。我們不要再去分析歷史了，那是一字一淚的”、“近代史是怎麼樣形成的？我對民族的苦難開始感受到了”。為何她的心會“隱隱作痛”？因為她並非以第三者的身份去看歷史，而是用自身的生命投入歷史，投入古人、投入同胞的生命中去感受的，因此對於古人、同胞在面對歷史中的種種挑戰、艱難，乃至不公道，會感同身受，內心“隱隱作痛”。可能有人會問，黎老師的這一種深情，是否只是一種局限的、主觀的民族情感？固然在黎老師的深情之中，有著民族的情感，但是在根底裡，是有深刻的、普遍的道理作支持的。正如黎老師常常教導我們，人要學習、追求一“普遍究竟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或道”，當然，此需要我們通過自身生命的成長，才能夠逐步發現。黎老師很有信心地認為，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早已發現此真理或道，而且對其之追尋與體會，古人很早就已經有非常豐富的經驗。然而，此真理或道並非離開現實的世界，而是存在於現實的世界之中。歷史人物之人生，就是在展現此真理或道。

在近代史中，黎老師很喜歡講林覺民與他所寫的《與妻訣別書》。林覺民面對近代中國的苦難，眼看千萬同胞受苦、國家陷入亡國的地步，心中痛苦、不忍；為救國，他甘願犧牲自己以成全大局。然而，自己尚有懷孕的妻子，如何？遂於革命前夕，忍痛寫信給妻子。他寫信的時候，“淚珠和筆墨齊下”，而且一再對妻子表示“吾至愛汝”。為何要犧牲自己、離開妻子？他對妻子說因為要“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為天下人謀永福也”，雖然十分珍惜他與妻子的愛，但是“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林覺民把其與妻子的愛，化為對國家民族的大愛，並且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支持他去革命、乃至面對死亡。黎老師也常常提到林則徐，說“他為了解決英國人販賣鴉片毒害中國的問題，不斷和外國人和許多貪官周旋，連生死毀譽也不顧。當時我看後，頓時感到很震撼：原來做人是可以如此的！可以連生死毀譽都不顧！經過多年的學習，我便知道這是‘即義見命’，就是看到義之當為，即刻擔起這使命，生死毀譽只是閒事。”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中所記錄的人物，呈現了一種普遍的道——人之原始之性情，由此而產生對歷史的期盼與承擔，不管世變如何，都有終極的嚮往。黎老師在其對於中國歷史深厚感情的背後，是藏著對於這“普遍究竟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或道”之嚮往的。即此感情與嚮往，就成為她的深情大願。所以她年少的時候，就已經立定心志，“在現實生活中，我不會坐視以強凌弱的事情，盡力在意識中彌補我們同胞過去的淒涼”。在追隨霍師學習以後，黎老師就更加擴充其少時之心志，在法住中實踐，無怨無悔。

或許，很多人會錯誤地認為，即使黎老師怎麼勇猛付出，甚至犧牲自己也好，她還只不過是局限於法住之中、只不過是為了霍師而努力而已。但是，如果大家明白上文所論，如黎老師所言之“普遍究竟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或道”、古人之“即義見命”、歷史中由人之原始性情所產生對歷史的期盼與承擔等，便會領會到，黎老師是從整體的歷史文化層次去投入法住的承擔的。黎老師對中國歷史之看重，是有著廣大的“越千年之志”的，此即直承孔子述《春秋》的精神，乃以微言大義，從具體的歷史人事上作批判，從而樹立標準，使後世能得以跟隨。即此一念，即一方面不離現實，一方面超越現實，“通古今之變”。我們認為，黎老師雖然尚未寫出成體系的歷史著作，然而她以生命作筆、法住作紙寫成了一部不朽的歷史。我們不自量力，要把此部“巨著”的重點智慧申述，讓大家得到啟發。請各位拭目以待。

